

神学与当代哲学

——第九届“神学与人文学”暑期国际研讨班
会议综述

Theology and Comtempory Philosophy: Review of
the 9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蒋秀云

JIANG Xiuyun

作者简介

蒋秀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IANG Xiuyu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xiuyun0614@163.com

Abstract

The Nin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 Humanities was held in Shantou,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August 5th to 8th, 2012. This year the Summer Institut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antou University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int Center for Christian Studies, Center for Christian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Shantou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This year the theme was “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e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King’s College London (U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ttended the Summer Institute and gave lectures to you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Nearly 70 young teachers and Ph.D. candidate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submitted papers and participated in i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main theme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Keywords: Theology, Humanities,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Review

又到一年暑期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基督教研究中心和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携手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于2013年8月5日至8日召开第九届“人文学与神学”暑期国际研讨班。以“神学与当代哲学”为主题，牛津大学的本杰明·摩根（Ben Morgan）博士、加文·弗勒德（Gavin Flood）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奥利弗·戴维斯（Oliver Davies）教授、克莱门斯·赛德迈克（Clemens Sedmak）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关瑞文教授、温伟耀教授和卢龙光教授，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和耿幼壮教授，贤集汕头大学，分别作出精彩的主题演讲。他们探讨的内容涉及“反向”逻辑、“主体性”、“共享性”等话题，颇有启发，余味无穷。同时，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的60余位中青年学者还围绕“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现当代哲学与美学”、“中西经典翻译与诠释”、“基督教历史与思想”四个分论题进行讨论，努力探寻不同身份主体下各学科汇通的可能性。现对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耦合“反向”逻辑

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社会及学术界的存在，仍然面临合法性的危机。基督教遗产仅仅是一种信仰经验吗，其思想传统中有没有一种可供借鉴的意义结构和真理系统呢？基督教神学思想与人文思想能否在“非宗教”的学术语境下，以“信仰悬置”和“开放性”为原则，以“反向”逻辑为方法，相互激发，并为诸如文化身份、价值立场、意义生成等根本性问题提供启发呢？

20 世纪神学家卡普托 (John D. Caputo) 指出, “列维纳斯的重述……可以前溯到基督教的《新约》和克尔凯郭尔, 后推至巴丢和齐泽克, 勾连其间的则是《新约》中的圣保罗。”^① 为什么是保罗? 为什么当代思想家屡屡重提保罗? 齐泽克认为, 基督教有一种 “反向内核”, 而它在保罗身上有很直接的体现。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在题为《从神学、哲学及〈圣经〉的角度来看使徒圣保罗》的演讲中, 解析了保罗将基督教从犹太教支派转变为普世性宗教的过程。他认为, 保罗将外邦人带进耶路撒冷, 允许他们不行割礼、不守律法, 从而将原属于一个民族的信仰变成普世性的信仰。所以保罗而非耶稣才是基督教真正的创立者。而保罗之所以能够确立基督教的基本原则, 恰恰在于一种 “反向” 逻辑: “他不属于基督的小圈子”。

卢龙光教授认为, 传统对《罗马书》的理解受马丁·路德影响, 只停留在 “因信称义” 上。而史怀泽却发现, “因信称义” 其实只是在保罗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才有, 其他 11 卷书中很少, 而 “在基督里” 这一概念却遍布全 13 卷)。因此, 卢龙光教授赞成史怀泽的看法, 认为 “在基督里” 才是保罗出现最多的思想。其中不仅关涉哲学和神学, 更与神秘经验相关。保罗 “在基督里” 的宗教体验, 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应该成为激发神学家、哲学家思考的泉源。

近年来, 中国学界普遍关注基督教神学与一般人文学术的互动。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基本是 “非宗教的”, 神学研究在一般大学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领域自发而生。尽管始终有人质疑 “学术化” 的神学是否成其为 “神学”, 但在杨慧林教授看来, 一旦不为信仰所囿, 神学的逻辑可能恰恰会为文化身份、价值立场、意义生成等根本性问题开辟巨大的思想空间。在题为《巴丢关于 “意义” 的公式

^① John D. 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39.

为什么更有意义》的演讲中，他以巴丢的意义公式回应了杜继文先生的访谈文章《“研究宗教”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他再次明确：研究基督教神学，关键既不是“知识性传播”、也绝非“信仰性传播”，而是解析基督教传统的意义结构、把握基督教神学的独特逻辑。

杨慧林教授详细解析了巴丢的公式： $E \rightarrow d(\epsilon) \rightarrow \pi$ 。其中，E 代表“事件”（event），d 代表“决定”（decision）， ϵ 被解释为“关于事件的宣称”， π 则是“对一个事件的忠实”。按照公式中的第一个环节：人自身本来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只是“宣称”一个“事件”，结果是“不可决定的”通过与“事件”的关联而得到了“决定”（decision of the un-decidable）。按照公式中的第二个环节：“关于事件的宣称”又带来“对一个事件的忠实”，于是“主体”被“建构”出来，“普遍性”得到了一种形式，一切“意义”也都成为了可能。

杨慧林教授发现了上述意义链条中最为独特的“反向”逻辑：由“回应”而生成的“责任”和“身份”，因“不可决定”的“决定”而被构成的“主体”和“普遍性”，其实无需实体的、而只需逻辑的依托。一切“可能性”的基础都是“不可能”，一切“确定性”都来自“不确定”，一切“说”都依托着“不可说”，一切“谈论上帝”都导源于“不能谈论”。

耿幼壮教授在演讲《圣像的修辞——从形象到声音》中，重述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故事，与杨慧林教授的“反向”逻辑形成了共鸣。阿加尔派艺术家为上帝画像，可艺术家因为上帝脸上的光芒而无法完成画像。上帝就亲自动手把画布按在了自己的面容上。这一奇迹般的机械复制方式使这幅圣像与出自凡人之手的肖像或偶像区别开来，使悖谬和奇迹所具有的“逻辑”意义得以彰显。

香港中文大学关瑞文教授在题为《后殖民抵抗：再读吴耀宗的上帝观》的演讲中，以霍米巴巴的理论解读 20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

本土化神学的抵抗。他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反向逻辑”，即“power”与“resistance”的关系。在他看来，不是“resistance”策划出一个抵抗，而是“power”向“resistance”发出一个邀请，并由“resistance”来阐明这种“power”。关瑞文教授正是从这种“反向”逻辑出发，探讨吴耀宗融合基督与科学的过程，发掘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在“人”的神学建构中包含的抵抗殖民的成分，分析这种抵抗如何在西方“帝国”的隙缝中生成，又如何促成了东西文化相遇中第三度空间的诞生。

香港中文大学的温伟耀教授在《上帝与人间的苦难：一个神哲学的回应》中则以休谟的论式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反向”阅读。命题一：如果上帝是至善的，他不会容忍世上充满苦难和罪恶；命题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他是有能力可以制止罪恶和苦难的发生。命题三：这个世界事实上充满了苦难和罪恶。于是温教授推导出了命题四作为结论：“上帝如果是全能的，他就不能是至善；如果他是至善的，他就不可能是全能的”。温教授于廿多年前丧妻，而当时又要抚育严重智障的幼女晓华，后来，晓华以二十六岁之龄离世，饱尝世间丧亲之痛，他却因受苦而更深刻地认识神，更倾向于肯定人间苦难的真实，努力回答否定上帝真实性的质疑。

与会青年学者在分组讨论中也对“反向性”问题作了回应。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张华教授发现了费奥伦萨在重构其“基础神学”中的“反向性”逻辑。他认为费奥伦萨虽未在其研究基础神学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何谓基础神学，然而，通过对神学基本事件、神学基本问题的逐一论述，他实际上又潜在地回答了何谓神学这一根本问题。湘潭大学李志雄教授则在其《马克思“非宗教之后”的信仰观》论文中阐述了马克思的宗教观，彰显了“宗教”与“非宗教”反向性逻辑。

“反向”逻辑源自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的自我反思，致力于打破既定思维模式的束缚。对中国当下学术界来说，或许为人们倾听意义的真理开辟出一种新的可能。

反思“主体性”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本届暑期班的一个关键词，杨慧林教授以巴丢的意义公式描述了一个“没有办法决定的主体”，关瑞文教授则努力在后殖民语境中建构一个亚洲人的主体，戴维斯教授超越了西方启蒙运动后那个分裂的主体，摩根博士则从中世纪那里找到另一个主体，温伟耀教授发现了基督徒受抚慰的主体，卢龙光教授以保罗为例努力重新建构基督徒的身份主体。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克莱门斯·赛德迈克(Clemens Sedmak)教授在演讲《汉娜·阿伦特与奥斯维辛之后的哲学》中，很大程度上触及的就是主体在现代性中的危机。阿伦特所说的阿道夫·艾希曼身上体现的“平庸之恶”，也揭示了现代主体的问题，即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和个体反思的缺失。赛德迈克教授认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哲学面对“语言的限度”、“独特性问题”、“表达”、“责任”、“调解”、“竞争”、“记忆”等七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而应该是由怎样的“主体”担负记忆与反思的伦理责任，则是我们在奥斯维辛灾难之后用法无法回避的问题。杨慧林教授认为，“建构性的主体”与“投射性的他者”一样都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单向话语，不仅是思想上的谬误，也是现实冲突的根本缘由。他以巴丢的意义公式阐释“被构成的主体”随着事件的“出现-消失”而产生，同时也为普遍性打开了可能的空间。他认为，当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同学说对单向主体的共同警觉，这让我们有机会在其中看到一系列对“主体性”的重新界说。

尽管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在 20 世纪受到后现代哲学的批判和解构，可耿幼壮教授却相信“主体的消失”会让每个人都感觉不舒服。福柯在写作《词与物》之后就沉寂了好久，去感受、体验那些“不太好”的体验，来探讨人的权限、人性的极限。耿幼壮教授指出，福柯在他那本没能写完的《性史》的第一卷里试图建构某种新的主体，而这也是马里翁在新现象学中所致力的方向。在演讲《圣像的修辞——从形象到声音》中，耿幼壮教授阐述了以马里翁为代表的现象学在西方的复兴。马里翁打破了自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所坚持的现象学原则之一：即悬置上帝、不讨论上帝和超验的问题，马里翁勇敢地把上帝、神性的问题重新带入现象学，试图以礼物、爱欲建构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或者一种“没有主体性的主体”。

近年来耿幼壮教授一直在思考视觉感知范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属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倾听”。他认为，倾听能让人们在面对自我与他者、生活与艺术、政治与意识形态、社会与世界时，倾听自己的责任，使自己存在于世界之中，理解“他者—上帝”，成为自己的“主体”。

本杰明·摩根博士从英国哲学的自我认同性开始追问“自我”到底是什么。他运用现象学和宗教学的方法，以中世纪埃克哈特为例，提出自我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核心，更不是一个传统哲学所说的实体、一个“我思”，而是一个海德格尔所说“在世之在”，是在社会之中与他人共享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它还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超越”自己。

牛津大学的加文·弗勒德则把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前现代形式的主体性对比，发现“超越”概念是理解主体性的关键。弗勒德教授指出，“pratyāmavedya-”（“内在性”）本义为“自我了解的东西”。这种内在性既包含条件反射性的自我反思，也包括自我内省。加文教授发现，在佛教徒通过内省寻到自我之真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发

达的主体性意识。这种主体性思想并非个人主义,而是一种走在“成佛之路”的、可供所有人实践的“共享的主体性”。

与会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旭红则在论文《神学美学与意义问题》中发现 20 世纪西方神学在 1960 年代前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向美学、艺术领域靠拢的倾向,她认为这是基督教神学告别理性主导和主体主义、由现代范型走向后现代范型的一种必然趋势。

看起来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神学与人文学科的交汇,自我与他者之间沟通,几经碰撞已不可避免。然而,是否有一种普遍性的道路可供选择呢,有没有一种公共性的空间可以敞开,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迈向一条共享性的道路呢?

迈向“共享性”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戴维斯教授在横亘于中西语言、文化与历史的鸿沟中发现了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即寻找一种崭新的方式去理解什么是“人”。他在演讲《中西相遇:迈向一种人类存在的普遍性理论》中,以科学的自我认知为基础,将生物学意义上自我的认识与人类更加先进的理性思考、意愿、感觉和行动等能力融合在一起,找寻人类共同的普遍价值,使我们成为更加自由的、文明的、具有人性的主体。

北京大学的赵敦华教授认为,应把普适性看作是一个实践问题。普遍主义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它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去建构、创造,才能在历史中实现。在他看来,中外思想的交流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建构过程。他提出把《圣经》历史称之“神圣史”(Heilsgeschichte)或拯救史,从而把旧约和新约解释为一部《圣经》,首尾一贯的历史记载,而不是两部《圣经》、多种来源的叙事。为了给拯救史一个合理的哲学解释,赵教授特意作出了四点补充。第一,拯救史不能脱离历史科学所承担的义务。第二,神圣启示与

文字意义相关一致。第三,《圣经》中的“去神秘性”与“神迹”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张力。第四,《圣经》解释学的具有一定循环性。与他们这种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努力相应的是,致力于思考汉语语境中宗教学与人文学之间如何互相激发的杨慧林教授。杨慧林教授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不同领域的概念的“交叉”,努力打通圣俗之间、学科之间、传统与现实之间,重新激活可能被淹没在信仰话语当中的人文洞见,思考如何在质疑真理秩序的同时重建意义。他用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话来解释自己的努力,就是古老的宗教传统和当代生活处境、神学和人文学术之间的“相关互应”。

牛津大学的本杰明·摩根博士也与这些学者呼应,他在演讲中多次提到的一个词:“共享行为”。他还明确地强调了其中蕴含的一种互动关系:“interplay”或“interact”。在他看来,海德格尔谈论“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和“与他人共在”(being-with others)时,与发展心理学研究婴儿与看护之间的互动一样,都在强调一种互动关系,即人们与他人交往实践中建立的个人身份感。只有当人们放弃主体意识,放弃“我”时,才会发现这种人类身份的关系性。他说,西方传统认为,社会交往存在着一种身份或自我的独立,即前现代的“灵魂说”。但那时的灵魂并不独立,总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而现代的灵魂或核心被看成是一种自律的东西。本杰明·摩根博士就是要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来挑战这种传统观念。在他看来,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和“我”是社会当中和他人共享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本真的存在方式。

耿幼壮教授认为,马里翁的思想从哲学转向神学,从可见的现象学转向声音的现象学,从上帝的面容转向上帝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共享性”的互动有着内在关联。因为“互动”其实就是不断地彼此回应,“倾听”他人的面容就是听到其发出的召唤。在耿幼壮教授看来,对面容的研究不是说面容最终会给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意义,而是说“我”处于或被置于对这一表达的不停倾听和

无限阐释之中。无限的阐释即意味着不断地回应，而不断地回应本就基于不停地倾听，这也是真正意义的“共享”。

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牛军博士在题为《“体用不二”之扞格》的论文中发现熊十力融合儒佛创设的宇宙论之核心命意在于“体用不二”，而隐贯其中的问题意识则是如何融合中西文化。上海师范大学的丁大刚则通过研究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翻译，试图在跨语际、跨文化、跨时空的语境下重构中国典籍的意义。他们的研究都闪烁着迈向“共享性”的希望之光。

循着这些话题，本届暑期国际研讨班的诸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打开了一种“反向性”逻辑，在神学与人文学、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融通中，探索重塑“主体”的诸种可能，尝试反思和实践广受质疑的“普遍性”，迈向一条通往自我与他者、不同文化之间的“共享性”的道路。